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日本游沪派文学研究

陈多友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日本游沪派文学研究

陈多友 著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游沪派文学研究 / 陈多友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2544-9

Ⅰ. ①日… Ⅱ. ①陈… Ⅲ. ①日本文学-文学流派研究 Ⅳ. ①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230788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王　俊

印　　刷：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4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1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46-2544-9 / I · 0198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徐真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初明	韦立新	平　洪	刘　岩
刘建达	杨　可	李敬平	余　东
陈开举	陈多友	林秀梅	郑　超
郑立华	章宜华	董燕萍	曾用强
戴桂玉			

总序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是与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勃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东西方文明在古老中国不断冲突、碰撞、磨合以及融汇，其剧烈之程度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中所未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清政府内洋务派为了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创设近代企业，将发展重点放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引起思想文化教育界强烈震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受到空前挑战，“制度”革新摆上核心日程，变法维新运动持续高涨。

此时，时代需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翻译者”，从一开始，外语就承担了读懂历史变迁、推动民族奋起自强的重任。中国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862年，被誉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外国语学院的京师同文馆应运而生，恭亲王奕䜣等人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上阐明了建馆的意图：“欲悉各国情景，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作为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同文馆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尝试。此后，得益于外语的译介作用，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曾负笈海外的严复翻译了一批重要的西方著作，他的译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尤其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戊戌变法之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开设英、法、德、俄、日5个语种的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学，且随即合并了京师同文馆，次年更名为译学馆。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外语专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建基和逐步发展。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外语学科增添了发展动力和活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适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促进中国近代化为宗旨的海外留学热潮激情涌动。1872 年到 1875 年间，由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提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 120 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些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此后，旨在寻求真知的官派和自费留学逐波激荡。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分布在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文化界等各个领域，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及至民国时期，一批既饱览西学又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海归”执掌大学外文系或者从事外文教学研究工作。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制订学术范式，建立课程体系，名师俊彦辈出，学术声誉远播。从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外文系的一流学术阵容可见一斑。在外文界，前辈不懈开拓进取，后学奋力继承创新，学术薪火相传，为外语学科在短短数十年内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1949 年以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嬗变，外语学科的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坚冰开始消融，外语学科又受到重视，得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近 30 多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思潮与思想观念更趋丰富多元，学科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这些变化既拓展了外国语言文学的外延，又深化了其内涵。尤其是，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明显增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外国语言文学创设了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外语界就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外语教育规划、外语学科发展路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国际理解的艰巨任务。哲学社会科学要繁荣发展，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既不狂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对外国优秀文明成果，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概否定。在纵横捭阖的大时代面前，我国学术发展更需要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外语院校和外语系学科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推进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服务于整个国家学术的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能力的大幅提升。

国学大师、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读书必先识字”，他自己就精通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还修习过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时至今天，要了解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要感受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文艺复兴的灿烂，要领略工业革命和西方哲学的魅力，要把握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类进步的脉搏，外国语言文学仍然是一种十分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工具、载体和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往往能更易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局域认知等，通过外语这座桥梁得以交流和沟通、发扬和传播，从而提升人类社会的福祉。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为适应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践行“立足平凡、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眼于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这种人才，具有较高的公民素养，“不能仅仅是语言、翻译方面的专家，更要在此基础上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成为外语精湛、专业突出、高素质的复合型、复语型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简而言之，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内涵可以用“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十二个字来表述，它包含了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命题。第一，大学生要追求自我完善，务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自持，赋予个体生命实际意义。第二，大学生要理性爱国，正确理解与认同传统文化，自觉参与现代中国社会一文化转型进程。第三，大学生要用全人类而非单一国家民族的眼光关注诸如气候变化、核扩散、大规模传染病等国际性难题，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开放的心态。

在全球化语境下，外国语言文学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顺应国家政策安排，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进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密切追踪国外学术前沿，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满足于“跟随”和“阐释”，要力争取得突破性、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外文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外语学科优势，整合相关学科资源，开展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为国家外交战略服务。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就外语教育教学和对外交往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既鼓励个人自由探索，支持学科集体攻关，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广东省政府鼎力支持下组建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就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日本地震海啸等重大问题对广东的影响及对策，组织外语专家和相关

学科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向有关方面提交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对政府施政和企业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走出去”，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环节。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可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健全高端国际型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的翻译名家，翻译并向海外推介一批中国文化经典和学术精品。要适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加强外语与经济、管理、法律、文化、军事、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保持传统语言文学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催生出一批能与国际学术界直接对话、具备学术话语权的新型特色交叉学科，加强与港澳台外语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学术组织有关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以“工程”、“项目”和“课题”等名义对高等学校发展实行管理和调控，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重要特色。目前，少数外语院校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高校行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拥有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等，这些总体上构成了外语学科领域的学术制高点。2008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入选广东省“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其系列专著凝聚了“语言·文学·文化”、现代技术与语言教学评估、跨文化交际与管理、翻译研究与实践等研究方向，来自政府的支持为广外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出版“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一来可作项目成果的初步展示，二来以此就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慢工出细活，厚积才能薄发。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样，依然任重而道远。

是为序。

徐真华[①]

2011 年 6 月

① 徐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文学院名誉院长。

目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近现代沪上言语空间的形成 …… 16

第一节　近现代沪上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 17

第二节　沪上公共领域的形成 …… 19

第三节　沪上言语空间里日本语境的形成 …… 24

第二章　日本“游沪派”文学发生的背景 …… 41

第一节　后鸦片战争时期 …… 41

第二节　“五卅”运动至“一·二八”事变时期 …… 52

第三节　“一·二八”事变后至日本侵华战争结束 …… 57

第三章　日本“游沪派”叙事文学中的“他者”形象 …… 67

第一节　村松梢风笔下的沪上“他者” …… 68

一、“魔都”里的渺小叙事 …… 70

二、《上海》的时事关怀 …… 75

三、他者与此者——作家思想的善恶循环 …… 77

第二节　井东宪的上海认识 …… 82

一、流浪汉眼中的沪上街景 …… 82

二、《红魔窟与血旗》中的历史指涉 …… 87

第三节　横光利一——复眼的旁观者 …… 91

一、新闻人的视域 …… 92

二、横光眼中的上海本色——混乱与无序 …… 98

三、《上海》的虚构与写实 …… 101

四、对前田爱《上海》论的重新解读 …… 104

第四节　金子光晴——污泥浊水的上海印象 …… 108

一、文本中“水”的意象 …… 108
二、《骷髅杯》的触感 …… 114
第五节 吉行英助——情色艺术的跟踪者 …… 119
一、滥情与肉欲 …… 119
二、作家笔下的情色 …… 122
三、吉行与日本新社会派 …… 124
小结 …… 127

第四章 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游沪派”文学 …… 130
第一节 榊山润——从军作家的“主体性” …… 133
一、“八·一三”淞沪抗战 …… 133
二、作家眼中的虹口地区日侨 …… 138
三、战乱中的租界印象 …… 143
第二节 草野心平的“大东亚”幻想 …… 146
一、草野心平的中国“缘” …… 146
二、田村俊子与《女声》 …… 148
三、“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闹剧 …… 153
第三节 历史隐喻——阿部知二与上海的“冬天” …… 158
一、两度沪上之行 …… 158
二、上海的民生与通货膨胀风暴 …… 162
三、进退维谷的处境 …… 164
第四节 武田泰淳的宿命 …… 169
一、良识架起中日之桥 …… 169
二、魂断沪上的日本人 …… 174
三、上海的审判,世界的审判 …… 178
第五节 堀田善卫——日本败退上海的见证者 …… 181
一、严酷的历史,特殊的体验 …… 181
二、云谲波诡上海滩 …… 190
小结 …… 195

第五章 日本“游沪派”文学叙述模式归类 …… 198
第一节 直接的“上海体验”型 …… 198
第二节 旅行指南型 …… 205

第三节　小说·诗歌·随笔 …… 210
第四节　“国际都市”聚焦型 …… 219
第五节　舶来的“魔都”意象型 …… 222
第六节　“黑社会”叙事型 …… 227
第七节　战争叙事型 …… 231
小结 …… 238
结　语 …… 239
参考文献 …… 247
附　录 …… 252
一、本论文所涉及的报刊 …… 252
二、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所涉及的主要作品 …… 253
后　记 …… 25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所谓“上海学”在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成型，同时也随着中国内地对相关研究的渐趋深入，人们普遍意识到，1840 年国门被迫打开后，上海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中英南京条约》推上了历史前台，扮演起中国百年探索现代化道路之实验区、领航员的角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握住现代上海研究就找到了中国现代性[1] 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和

1. 现代性(modernity)，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人文、社会、哲学、政治、法学等领域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鲁道夫夫妇在《现代性中的传统性》一书中对之下过如下定义：“现代性”意为：地方纽带和地区性的观点让位于全球观念和普世态度；功利、计算和科学的真理压倒了感情、神圣和非理性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的相互联系不是依据出身而是靠选择；他们以主宰者的态度而不用听天由命的态度去对待物质环境和人类环境；认同是被选择和被获得的，不是被硬性确定和被认定的；工作在行政组织中进行，而不是在家庭、住所或社区中进行；成年期被推迟，年轻人准备承担他们的任务和责任；人类的寿命延长，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将把很多权利交给年轻人，男人把他们的权利交一些给妇人；人类不再作为种族分开而在社会和政治中认识到共同的韧性；政府不再是超人的权力象征，不让普通人进入，而是以参与、允诺和对公众负责任作为它的基础。(《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P228)这样的概括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既有人的外部世界，也有人的内心世界；既谈到人与人之间的过从，也涉及人的社会地位与公共关系。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说得更为彻底：现代性“就是一种个体化的、私人的观点，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首先都落在了个体的肩上”。他还认为“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立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P13)。这就从形而上层面对现代性的理论背景作了界定。而 C·E·布莱克却警告说，“传统”与“现代性”，本质上是从组成现实的“变量的连续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而“历史动态图式中的单一框架是为研究目的而放大的”(转引自美国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P82)。现代性，从字面上看，它标示的就是现代的属性，它可以包容现代甚至现代化。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表述。但是，从日常使用的范围或习惯上讲，现代性，更多的是指思想，或者说它是指人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评价标准，或是指人的处世态度、处事原则。吴定宇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化这一概念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新表述，追求现代性，实质上就是对现代化文化进行整合的过程。在现代化的文化整合中，器物层的更新最受欢迎，但器物层的革新却不是依靠人的自然力量，而是(转下页)

线索。

据笔者分析,在中日两国学界至少有这么一点共识:对中国学者而言,研究现代"上海学",不可忽视日本这一参照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的现代性叙述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这个命题作出概括性解释。一,上海的"现代性"体验的扭曲从文化风土层面折射出了日本的"现代性"体验的曲折;二,上海的"现代性"体验的扭曲成为经历过,并且仍然继续经历着"现代性"曲折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刻意表达的叙述对象;三,在日本的近现代中国叙述中,"上海"成为一种符号或者隐喻,它从某种角度深化了中日之间业已被图式化了的"此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伴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高涨,日本走上了一条扭曲的富国之路,在"脱亚入欧"、"征韩论"等褊狭的政治言说的动员下,其国家主体意识的表达逐渐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所捆绑,日本开始刻意模仿西方帝国主义者,对周边国家发动起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军事冒险的成功,一方面使自己由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殖民主义的加害国,残酷地阻止了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其他国家与地区进入现代化大门的脚步;但是,与此同时,又使得自身在精神文化上日益游离于东亚文化母体之外,从而在一阵狂乱的对外侵略掠夺之后,最终迷失了作为东亚古老国家的主体性。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以及"大东亚圣战"的发动,就是其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所遭受的沉重打击,雄辩地述说了其"现代性"

(接上页)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实现的。制度层的改革需要权利来推行,精神层的文化变化则需要心理认同来催生。精神层的整合,也是用现代化的观念重构民族心理、"换脑筋"的过程。不能不看到,现代化的观念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思想。后者是个芜杂的思想系统,包括了健康的和有害的、发展的和被淘汰的、前沿的和腐朽的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如新纳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享乐主义等不能看作是现代化的观念。前者则是后者中适应历史潮流、健康、发展和前沿的思想意识。而且现代化的观念并非为西方国家所专擅,在某些已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例如日本,也存在着。日本的现代化观念自有其特色,其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颇有差异,不能等量齐观。因此,在整合中不能予以轻视和排斥(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文化》,1993年第一期)。

体验的扭曲[1]。

如此“现代性”体验的扭曲对日本近现代以上海为素材或者切入点的中国叙述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上海变成了表现近现代“中国/日本”这一二元对立结构的导入项，或者说就是俗称的“纽带”或“媒介”。正如迄今为止日本的中国近现代研究，就十分重视以上海为焦点的“上海学”研究一样，中国的以上海为突破点的日本学研究，亦是极其需要快速开展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以日本为参照系的“上海学”研究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日本在精神文化上所表现出的“现代性”体验的曲折不仅反映在其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经济制度、国际关系准则、外交安全理念以及军事策略等主流意识形态、群体心理的表达上，也渗透于普通国民乃至知识人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哲学思想等文化价值的诸多方面[2]。然而，

---

1. 据龚隽考证：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日本的现代化一直充满了学者们所说的“二重性”，即一面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的新要求，一面是来自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强大反弹，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反抗的现代性”的社会类型。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同步的同步性”所构建出的悖论，在现代日本就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紧张：现代主义寻求逃离历史，而同时又依靠于一种更古老的文化和历史的具体性、完整性的表述，作为对现代性所造成的抽象和碎片式生活的替代。于是，对现代性追求的本身就蕴涵了自我瓦解和克服的因素，这种紧张所产生的日本现代化的不平衡，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末，蜕变为对于“克服现代性”的呼唤。具体说，就是通过构造一种历史和传统的回忆，从一种东方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主义的叙述中，去抗争由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反抗现代性的文化主义，很自然地经由“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抽象”，逐渐地，同时也是内在性地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 龚隽曾指出：日本京都学派就“现代性”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其重要代表西谷启治在1942年7月，由日本当时主要批评家、思想家、学者和作家所组织的一次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以“克服现代性”为主题的讨论会上，他提交的论文就针对现代性与欧洲中心论的关系，明确反对以欧洲文明来为整个人类定义现代性。他认为，“现代的事情”被简单理解为“欧洲的事情”，这种欧洲中心的观念给日本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外来文化是以所谓“进步”的观念而输入的。他指出，要克服这种偏见必须重新建立关于人性的自我意识，“重构世界观的基础”，而解决之道在于回到“东方宗教”的实践，特别是以佛教为基础的“主体虚无”的哲学中，即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的概念，去避免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文化与科学的分离。而另一位京都学派的历史学家，则更明确地把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的克服具体解释为“对政治上民主的克服”、“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克服”和“思想上自由主义的克服”。把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反欧洲中心论的议题结合在一起，出路就自然地转到“寻找一条不是以西方，而是以日本来界定现代性的道路”，这实际暗示了批判现代性的背后，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动向。

迄今为止,有关"上海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政治、经济等领域,而对于其投影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叙事或言说方式却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说,尽管在中日两国学界,从近现代文学的角度就此问题所做的专门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是,基于中日文学关系史的发脚点,围绕近现代上海言语空间中日本叙述因子所展开的研究,迄今为止并未呈现出一定规模的研究态势,更无从谈起深度与广度。

鉴于此,笔者在本课题中,不打算就"上海学"研究做宏阔涉及,只单就日本"游沪派"文学的形成与流变问题,以历史还原的手法,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手法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也就是说,笔者拟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一下以上海为舞台的日本近代文学所展开的轨迹与状况。

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日本人就与言语都市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上海抢滩,并在此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向中国内地辐射、渗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几年间,即所谓的租借地黄金时期,全世界都将焦点聚集在上海这方土地上,上海扮演起金融贸易都市、革命都市、自由都市、犯罪都市、时尚都市等数不胜数的角色,受各种各样的欲望的驱使,许许多多日本文化人夹杂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之中,涌向沪上。在他们及西方殖民者看来,东西方文化混合所形成的沪上十里洋场文化堪称"东方的巴比伦"、"冒险家的乐园"、"亚细亚的娼妇"、"世界的缩影"、"无与伦比的自由都市"、"魔都"、"蛮地"(赵梦云,2004)。时而竭尽溢美之词讴歌之,时而又如歇斯底里的泼妇骂街,将污泥浊水一股脑地倒向它。可见,面对风情万种的沪上,日本人难以掩饰自己复杂的情感。

学者赵梦云(2000:24、25)将近现代造访或旅居过上海,并创作以上海体验为题材的小说、游记、诗歌等作品的日本文学家、报人之属统称作"游沪派",其范畴内之文学即为"游沪派"文学。笔者认为如此命名十分贴切,作为学理化的概念,它具有清晰的内涵与外延,并且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概念、范畴、言说具有兼容性,可以在相同的言语空间内流通,因此在本书中予以借用。

下面话题仍回到日本"游沪派"文学的历史沿革上来。据笔者考察,自20世纪初以来,在大约百年之间,此类日本作家、报人层出不穷,他们争相

以上海为题材创作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1]。赵梦云曾将日本"游沪派"文学作了四个时代的区分：

一，以上海为舞台的文学作品逐渐在日本文坛出现的时期（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该时期为开拓期，代表作家及作品有：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村松梢风《魔都》；

二，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上海的、不同体式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的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中期）。这个阶段为鼎盛期，代表作家及作品有：村松梢风《上海》、横光利一《上海》、井东宪《上海夜话》、吉行英助《新上海的隐私》、直木三十五《日本的战栗・上海篇》及林房雄《战争的侧面》；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之间的往来暂时中断，战前或战争期间有过上海体验的作家抱着怀旧的心绪创作以昔日上海为题材的文学作品（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前期）。该时期为怀旧期，代表作家及作品有：武田泰淳《蝮蛇之尾》和《上海的萤火虫》、堀田善卫《历史》和《在上海》、火野苇平《魔河》、金子光晴《骷髅杯》、鹿地亘《上海战役中》、林京子《米歇尔的口红》和《上海》；

四，中日恢复邦交后，一批出生在战后、成长于日本、未曾了解上海过去的日本作家，纷纷创作以上海为题材的新型作品而崭露头角（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至现在）。此乃复兴期，代表作家及作品有：斋藤怜《上海借钱王》、井上厢《上海的月亮》、伴野朗《上海紧急出击》、村松友视《上海摇篮曲》等等。[2]

本书关注的内容跨越上述历史区分中的前三个时期，因为第四个时期情况比较特殊，文献资料收集尚不足，暂且存而不论。以后另著再探讨。

众所周知，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作方法，可以从思想内容入手，也可以从艺术分析切入。若是采用后者方法，原有的将各种不同体裁、样式同时讨论的综合文学史就需要改变。因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影视文学

1. 详细可参照赵梦云《上海 文学残像 日本人作家的光与影》（现代亚洲丛书 35，日本：田畑书店，2000 年）之附录《上海 文学残像》相关年表。不过，该年表并没有涵盖"游沪派"文学的全部文本。

2. 参照赵梦云《上海 文学残像 日本人作家的光与影》、现代亚洲丛书 35，日本：田畑书店，2000 年。

剧本等不同体裁或样式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于是，分类文学史的重要性便凸现了出来。有鉴于此，本书以叙事为切入点，主要集中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但创作时间跨度中的下限为60年代末——著者按)围绕上海这一言语空间日本作家所创作的小说里所体现出的各种叙事事实，突出该历史语境下此类边缘性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症候群的特征以及存在的方式，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此类小说在叙事层面的不同追求，揭示其叙事演变轨迹，从而揭秘日本近现代上海题材小说中被以往研究所遮蔽了的另外一些层面。当然，为了便于全面总结该时期日本"游沪派"文学的总体风貌，时而亦顺带性地涉及诗歌、随笔、散文、纪实文学等文类。但是，行文过程中，并不就后者作过多的展开。

然而，仅仅对该时期上海文学场中所发生的日本文学史实进行单方面的叙事研究，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叙事理论所关心的是叙事人如何处理故事、安排情结的问题。其理论方法有两个着眼点：一，将文本看作一个不受外部规律制约牵制的自足的实体，排斥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以及作者意图对文本的干涉，只有文本自身才是研究对象；二，叙事学并不立足于对个别作品的研究，而是要寻绎出存在于作品中的结构或者规律。因此，叙事理论细致地分析了诸如叙事人、人物、情节、视角、叙事眼光、叙事声音、叙事逻辑等一系列叙事要素，却不屑于问津文学的外部因素。但是，正如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所指出的：精神科学(包括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都是种族、环境、时代的产物。"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孤立存在，单纯讨论文本本身难免有所偏颇，同时这也是一种分析的缺席。

因此，本书在对该时期日本文本进行审美层面的解读的同时，也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文本进行社会历史层面的解析，尤其关注作家讲述故事的时代，关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影响。基于此，本书所探索的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生的认识方式和解释模式，是一种融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于一体的理论阐释。这一阐释使本课题研究有可能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将叙事研究与文

1. 丹纳《艺术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P6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